

文野之間——析論《小說林》「叢錄」中之異國形象

謝佳澄¹

摘要

《小說林》「叢錄」欄描述異國形象時，多使用「紀實」的筆法「記異」，然而此筆法卻隱含譯者對於「世界列強」和「原始民族」的「文野」之看法。八國聯軍之後，晚清所關注的世界列強雖然發明了各式文明器物與制度，但在戰爭中仍不免造成眾多死傷，因此譯者一面讚揚列強之文明，卻也略過了戰爭造成死傷的問題。而譯者雖未評論原始民族的風俗迷信，但從中仍可見晚清中國對於異國的關注，多少反映了自身對於特定議題（如女權、革命等）的關注。此外，譯者描述原始民族的食衣住行時，多維持其一貫的客觀筆法，亦符合「叢錄」本身的「記異」性質。故探討《小說林》「叢錄」中的異國形象，有助於理解晚清小說之外的文本，不只將異國作為值得學習的他者，同時透過國外新聞媒體而產生基於事實的理解，譯者在接受異國資訊的同時，也以此反照中國自身之「文野」。由於不同體裁而形成不同的分工方式，「叢錄」欄正填補了「小說」想像之外的現實。

關鍵詞：小說林叢錄、異國形象、文野、紀實、記異

¹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候選人
通訊作者：謝佳澄，E-mail: 103151505@nccu.edu.tw

壹、緒論

有「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之稱的《小說林》，創刊於1907年3月（光緒33年正月），停刊於1908年10月（光緒34年9月，因主編徐念慈驟逝而停刊），共12期月刊。創辦人為徐念慈、黃人、曾樸、丁祖蔭等。主要作／譯者除了二人之外，尚有陳鴻壁等人，是由江蘇常熟人創辦、主持的同人雜誌¹。《小說林》的內容以著譯小說為主，兼及戲曲（6種）、詩詞（一百餘首）、隨筆（叢錄8種）、文藝評論（論說4篇；詩評5種）、中外人物風景畫47幅、燈謎、雜記以及人物小傳若干種²。由上述內容可見「小說」一文類是大宗，故歷來研究中較關注於創作和翻譯小說之特色；編者、作者之身分考訂，以及小說理論對於中國白話長篇小說發展之影響³，而較少提及小說以外的其他欄目和研究材料，唯有姚洪兵略為提及「文苑」與「叢錄」兩種欄目，「文苑」刊載詩詞、戲曲（包含雜劇與傳奇）、謎語等內容，而「叢錄」則蒐集笑話、名人軼事、奇風異俗等新聞。但此研究仍較關注「文苑」欄，並指出其中具有現實性和革命性；文學性；趣味性和娛樂性的特色⁴。

縱然「著譯小說」是《小說林》中最受關注的文類，然而筆者認為其他文類亦有可觀之處，即便「文苑」呈現出《小說林》創作者傳統文人的過渡特色，或許開闢出此欄目也是為了吸引不同種類的讀者群⁵，但若將「叢錄」一欄列入考量時，則會發現「叢錄」多是譯自國外報章雜誌，且內容多和外國事物相關。此欄目在《小說林》中由不同譯者組成，分別為陳鴻壁〈印雪移簾屑〉（第2期）、〈印雪移譯叢〉（第8期，筆名陳鳳壁）、〈印雪移隨筆〉（第10期）；郭節〈丹隱居譚塵〉（第8、10、11期）；紫崖〈紫崖隨筆〉（第7期為之一、第9期為之一和之二）、〈西笑林〉（第6、8期）；蟄競〈海外逸聞〉（第12期）。根據陳鴻壁在第1期為〈印雪移簾屑〉之定位，可知其描述內容多為「瑣事異聞」，材料來源則是「西國報章雜誌及小說家言」（2期，頁1）⁶，此欄目之命名是和其所翻譯的維多夫人短篇偵探談（即是《印雪移譯叢》）相對，反映出陳鴻壁藉由不同載體所呈現出的異國形象。至於〈印雪移簾屑〉之外的其他專欄雖無譯者說明，但從其欄目歸於「叢錄」之下，可知此或是繼承自六朝叢殘小語之體裁，由此文類所呈現的異國形象，正可和小說所呈現出的異國形象互為發明。

1 姚洪兵：《《小說林》研究》，徐德明先生指導（江蘇：揚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11-19。

2 郭浩帆：《中國近代四大小說雜誌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頁228。

3 如郭浩帆：《中國近代四大小說雜誌研究》；樂偉平：《小說林社研究（上）、（下）》，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姚洪兵：《《小說林》研究》。

4 姚洪兵：《《小說林》研究》，頁8-10。

5 姚洪兵：《《小說林》研究》，頁10。

6 本論文採用之版本為〔清〕小說林總編輯所：《小說林》（上海：上海書局，1980年），以下將隨文附註期數與頁碼，不另行加註。

而關於《小說林》中的小說研究，亦多關注於小說中所呈現出的異國形象，如鄧韻指出翻譯小說中的他者意象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小說創作⁷；朱芯儀則指出晚清翻譯小說中呈現出對於外國的矛盾心態⁸。值得注意的是，朱氏也略為提及叢錄中的外國意象意義，相對於翻譯小說中代表文明與進步的外國意象，叢錄中的外國意象較偏向於「他者的民俗奇觀」；而顏健富則從異國形象學探討晚清小說作者群，如何於小說敘事中描述、勾勒、想像「異國」，並從中折射出「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對照⁹。但可進一步討論的是，「叢錄」中仍有不少關於現代文明的敘述，因此若只關注「民俗奇觀」的蠻夷或劣者形象，對於「叢錄」的理解仍不夠全面，故本文將探討《小說林》中的「叢錄」一欄，並分為世界列強與原始民族兩部分，即是文明國家與野蠻民族的「文野」概念，析論異國形象之呈現方式及意義，以見晚清譯者是如何塑造異國形象及時代意義；而其塑造方式和晚清翻譯小說的「想像異國」有何差異，亦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

貳、世界列強的啟發：模仿文明

世界列強對於晚清中國的影響，「政治情勢：革命、戰爭與文明」與「制度與物質：學習與模仿科技文明」兩部分，討論中國為了躋身列強所採取的模仿與改變。

一、政治情勢：革命、戰爭與文明

在八國聯軍（1900年6月10日-1901年9月7日）之役後，參與戰爭的十一國列強成為中國關注的焦點，以八國尤然（俄國、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奧地利、義大利、英國）。1901年9月，十一國（八國之外包含比利時、西班牙與荷蘭）與清廷簽訂《辛丑條約》（即是《辛丑議定書》）後，除少部駐軍京津地區，聯軍解散。¹⁰而在《小說林》的「叢錄」中，十一國出現的次數統計如下：英國 22、美國 19、法國 16、德國 16、俄羅斯 9、日本 7、西班牙 6、義大利 4、比利時 4、奧地利 2，荷蘭 0（詳參附表）。而在十一國中，除了荷蘭以外，其他十國的出現頻率是「叢錄」中較高者，可見譯者們所選擇的新聞可能受到政治的影響，故較關注上述列強的各式新聞。在這些列強的相關新聞中，和政治較為相

7 鄧韻：《小說林社翻譯作品與中國小說現代性》，費小平先生指導（成都：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頁41。

8 朱芯儀：《冷眼觀：晚清《小說林》的敘事與觀看》，楊玉成先生指導（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7月），頁71-75。

9 顏健富：《晚清小說的「異國」形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科技部計畫（2012年），計畫編號 NSC100-2628-H007-021-MY2。

10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89-405。

關的有英國、法國、日本、俄羅斯、比利時。而在八國聯軍之後的日俄戰爭，是另一個受關注的重點¹¹。〈衛生史材料之價值〉即引用此戰爭的相關資料：

頃日本陸軍部編纂日俄戰爭衛生史，凡有關係之材料悉皆收集，其上卷亦已脫稿。聞此項材料之費，約計日金三百八十萬云。(11期〈丹隱居譚塵〉，頁9-10)

根據筆者目前的研究所見，「日俄戰爭衛生史」似乎並非書名，陸軍省醫務局編輯並出版於大正13年(1924年)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戰役陸軍衛生史》，應是日本官方唯一描述此戰役的衛生史，故此書最可能和上述的「日俄戰爭衛生史」相關。此條材料中並未看出中國對於此戰爭的評價，唯有「日金三百八十萬」的材料費是關注重點，可見譯者認為編纂此書之費用超乎想像，故將之記入叢錄欄。

而日俄戰爭所衍伸的其他條材料尚有〈伊藤博文之賜第〉：

日本明治天皇嘉伊藤公統監韓國之勞，賜以憲法紀念館以為私第。館在大森，距東京數里，瀕于太平洋岸。頃經營甫畢，公于明治四十一年一月與五日〔中曆十二月二日〕，移入焉。(11期〈丹隱居譚塵〉，頁9)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於1906年至1909年任職第一任朝鮮統監，此引文之所以提及天皇賜予他大森的憲法紀念館(即現今的明治紀念館)為私第，是因為1885年12月，明治天皇根據其建議廢除太政官制，實行內閣制，他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兼宮內大臣，並開始起草憲法的任務，故被譽為「明治憲法之父」¹²。文中採取客觀立場，未對於日韓關係有任何評價，而是描述明治天皇對於伊藤博文的重視。

而日俄戰爭對於俄國的影響，則是第一次俄國革命(1905年1月22日-1907年6月16日)的產生¹³，此鎮壓事件發生之日便是血腥星期日(1905年1月22

11 日俄戰爭(1904.2.8-1905.9.5)是日本和俄羅斯為爭奪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戰爭。此戰爭使日本在東北亞取得軍事優勢，並取得在朝鮮與東北駐軍的權利，而俄國遠東的擴張計劃則受阻撓。詳參〔日〕井口和起著，何源湖譯：《日俄戰爭的時代》(臺北：玉山社，2012年)。

12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日韓簽定第一次日韓協約，韓國任用日本政府推薦財政及外交顧問；1905年日俄議和後，俄國承認日本政府對韓國的指導及監督權，日韓簽定第二次日韓協約，將韓國外交權移轉給日本，使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並設立統監府；1907年，朝鮮高宗李熙在日本逼迫下讓位於太子。詳參〔日〕森山茂德：《近代日韓關係史研究——朝鮮殖民地化と國際關係》(東京：東京大學，1987年)，頁200-206。

13 此革命起於東正教蓋龐神父(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帶領約三萬名工人到冬宮外廣場和平示威，目的是向沙皇遞交請願書，表達勞工階層與社會底層人民的困苦與遭受之欺壓，請求沙皇進行社會改革與終止日俄戰爭。負責守護宮庭的武裝士兵與示威群眾發生衝突，官方宣稱傷亡人數為96人死、333人受傷，保守估計約1000人傷亡。詳參〔俄〕博克老夫斯基(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日〕石川一郎著、潘既閑譯：《俄國革命全史》(上海：心弦書社，1930年)，頁166-202。

日)，之後大規模的罷工在各地陸續發生，暗殺事件與革命運動也風起雲湧。1904至1907年除了頻繁的社會運動外，也是恐怖暗殺的高峰期，社會革命黨格鬥組織、波蘭社會主義黨格鬥組織與布爾什維克格鬥組，策動了多起針對大臣、公務員與警務人員的刺殺或搶劫案件。〈俄國兒童之革命事業〉指出兒童甚至被動員參與此革命：

据日本新聞紀載昨年末之統計，所述俄國革命犧牲如下，死者總數二萬六千人，傷者總數三萬一千人，入獄者總數一百五十萬人。其死傷之數，比法國革命時猶倍之，此等革命之犧牲中，勞働者居大多數，前仆後繼，不少畏怯。目下表面雖似鎮靜，浦歐爾濱河岸之諸州，及高如索波蘭等地革命黨員，實異常猖獗，警察殆亦束手無可如何。如五月紀夫利斯之中學校學生開演說會於講堂，痛論政府橫暴之罪惡，校長聞之，立命解散，學生不服，反標校長出於校門之外。此事不過百中之一例。最可畏者，革命之說，深印於彼等兒童之腦，成為一種惡性的革命傳染病。十三、四歲之乳臭小兒，時時組織黨徒，襲擊官吏，強奪金銀，殆不以為奇云。(8期〈丹隱居譚塵〉，頁8-9)

而由日本新聞轉載的消息亦指出此革命中的參與者多為勞動者，死傷者極多。人民的不滿也表現在波蘭等地革命黨活動之盛，以及學生不滿政府的演說等。值得注意的是，譯者郭節以「可畏」和「惡性傳染病」描述此類反政府活動，而第八期發刊不久前的1907年才剛發生四場革命：即是5月潮州黃岡之役、9月七女湖之役、9月防城之役，以及12月鎮南關之役¹⁴。可見此刊物雖收錄有革命傾向的軼事，但並不代表所有譯者都接受此觀點。

除了革命之外，暗殺的層出不窮更呈現於〈暗殺學校〉一則：

俄羅斯警察，頃於芬蘭之特利歐加，發見特羅利斯托設立之暗殺學校。俄廷大震，此校在特利歐加海岸附近，有無數爆裂彈專門講師，講演製造火藥及投彈方法，教者學者，異常秘密。最初惹起警官之視線，即在陽曆五月，其學生之出入該校者，晝間則寂若無人，更闌人定之際，則出演種種秘密運動，警察密探之結果，遂於此校內發見無數之爆裂彈及製造原料。七月三日，突然拘捕學生十三名，審問之餘，罪以私造爆彈，此十三名學生，皆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對於審判官之態度，沉重無少畏怯。據校長義曼供云：彼在聖彼得堡大學化學科，究心製造火藥學有年，後在特利歐加創立此校，以為研究火藥之機關，確自認此為純正之科學，即教授紀愛資斯克以氏，亦同認此為純正之科學也。特為無學之警察官吏所誤會耳云云。當警兵入校搜索時，僅學生二十餘名演習其中，其實此校殆網羅俄國各地之青年，特無從稽查其名籍耳。被捕學生中，其一為波蘭人，審官問其研究火藥之理由，彼答曰：希望入俄都砲兵學校〔筆者案：即為聖彼得堡砲兵學院〕，將來以軍隊為終身之生涯者也。審官勃然色變。蓋俄國虛無黨〔筆者案：即為社會革命黨戰鬥組〕，隨地潛伏，惟軍隊為政府唯一之干城，故一聞此言，不

14 茅家琦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事編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168-171。

覺驚心動魄。又此暗殺學校之招募學生，概在俄都學生所出入之飲食店中，由招募員以暗號勸誘其來云。(8期〈丹隱居譚塵〉，頁2-3)

「勸誘」一詞的運用，也顯示出郭節並不完全贊同革命黨的暗殺行動；但描述革命黨學生受審判時「沉重無少畏怯」的態度，或許也反映出對於其黨人的敬佩。而此則引文還呈現出第一次俄國革命之後，1905至1906年間密集發生暗殺事件，可見芬蘭暗殺學校一事引起當局重要關注之因¹⁵。而暗殺學校之所以在芬蘭成立，是因為俄國第一次革命導致附屬國芬蘭大公國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大規模罷工（1905年10月30日-11月6日），使芬蘭走向民主化的進程，進而在1917年12月獨立建國¹⁶。至於文中提及被逮捕的波蘭人，則反映出1905年血腥星期日事件後不久，波蘭工業重鎮羅茲工人進行大罷工的狀況¹⁷，故此條紀載間接反映了波蘭在此革命前尋求改革與獨立之動盪局勢。由上述可見「革命是否能帶來文明」是譯者所迴避的問題，這或許是因為中國正處於國難當頭的局勢，也可能和個別譯者們對於革命的不同立場相關。

二、制度與物質：學習與模仿科技文明

（一）制度的學習

除了政治之外，「叢錄」中還關心列強建立的各種制度，如〈比利時之選舉法〉（11期〈丹隱居譚塵〉，頁10）與〈世界得專賣權之統計〉等，後者原文如下：

西曆一千八百零六年，世界得專賣權之統計如下：

美國	八四九、七五五
法國	三八五、六八八

15 遭到社會革命黨戰鬥組暗殺成功的重要官員，如1905年芬蘭大法官艾里爾·朔依沙朗－朔依尼南（Eliel Soisalon-Soininen，2月6日）、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2月17日）、莫斯科市長帕維爾·帕夫洛維奇·瓦洛夫（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Шувалов，6月28日）；1906年則有黑海艦隊指揮官格雷戈里·帕夫洛維奇·博布里科夫（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6月29日）、戰爭部長維特·薩哈羅夫（Виктор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харов，11月22日）、大臣會議成員阿列克謝·伊格納季耶夫伯爵（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2月9日）、聖彼得堡市長弗拉基米爾·勞尼替斯（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фон дер Лауниц，1906年12月21日）。詳參〔英〕大衛·科爾比（David Kirby）著，紀勝利等譯：《芬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14-121。

16 由約翰·科克（Johan Kock）領導的第一代芬蘭赤衛隊成立，罷工期間在坦佩雷發表紅色宣言，要求解散參議院，實行普選、政治自由、以及取消審查制度。1906年籌辦芬蘭議會，1907年舉行第一次不分男女的普選，選出第一屆會議員。詳參〔英〕大衛·科爾比（David Kirby）著，紀勝利等譯：《芬蘭史》，頁122-123。

17 同時在華沙與其他工業中心，也陸續發生罷工、示威或遊行。1月28日，在波蘭社會主義黨與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策動下，大規模罷工的示威民眾要求改善工人環境，以及給予波蘭人更多的自治權。詳參〔英〕耶日·盧克瓦斯基（Jerzy Lukowski）、〔英〕赫伯特·紮瓦德斯基（Hubert Zawadzki）著，常程譯：《波蘭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頁197。

英國	二六六、四〇四
比國	二〇三、二九二
德國	一九七、三七三
坎拿大	一〇六、三一七
奧國	八二、九三三
意國	七九、七〇二
瑞士	二四、七八六
俄國	一七、八六八
日本	一一、三四九

據右統計觀之，世界列國工業商業之進步，文野之程度，可以知矣！（11期〈丹隱居譚塵〉，頁6-7）

15世紀中期，在商品經濟關係初步發展的英國和義大利，最早產生專利制度的雛形。由封建君主政府以特許的方式，授予一些商人或工匠的某項技術以獨家經營的壟斷權。最早實行專利制度的是威尼斯，1474年頒佈《威尼斯專利法》，是第一部具有近代特徵的專利法，為現代專利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為現代專利法之雛型。近現代專利制度隨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興起，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近代意義的世界第一部完整的專利法產生於英國，1623年頒佈的《壟斷法》為現代資本主義專利法的始祖，已初步具備現代專利法的基本要素。歐美其他國家在本國工業革命前夕，也紛紛建立專利制度，美國、法國分別於1790和1791年頒佈本國第一部《專利法》¹⁸。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法、美、義之外，其他國家的專利法在統計此數據的1806年尚未建立，故引文中的年份或為1906年的誤植，也較接近《小說林》的出刊年份。如1812年俄羅斯方通過第一部專利保護法；日本1871年才實行〈專賣簡則〉，德國更遲至1877年方建立專賣法。譯者在文末指出此統計數據反映出「世界列國工業商業之進步，文野之程度」，可見列表中除了瑞士與加拿大之外的世界列強，是譯者所關注的對象，更強化了晚清中國對於西方列強「世界文明」形象的塑造。另外，中國未出現於列表中，也似乎表達出譯者暗示中國文野程度之分別。

至於按照統計數據多寡排列而成的表格，亦顯示出譯者當時世界列強的認識，而非按照訂定專利法的先後所排列，美、法、英列於前三名，而俄國與日本列於末座，或許是依照工業化進程所排列：彼時正逢英國第二次工業革命（1870年-1914年），後擴散至西歐（包括英國、德國、法國、低地國家和丹麥）、北美與日本（明治維新於1860-1880年代）；俄國工業化在1861年農奴制廢除後，資本

18 簡子婷：《歐洲專利制度整合之研究》，洪美蘭先生指導（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7月），頁8-9。

主義開始緩慢發展¹⁹，至 1880 年代工業革命基本完成，可見俄國與日本之工業化進程相近，但晚於較早工業革命的英、美、法，故列名於最末二位。

(二) 物質的模仿

至於在物質方面，則有各式生活用具的發明，如美國〈汽車進行中之電話〉(8 期〈丹隱居譚塵〉，頁 10)、英國〈電燈新發明〉(7 期〈珍聞 紫崖隨筆之一〉，頁 1-2)、北美「海底電線」(9 期〈紫崖隨筆之二〉，頁 1) 等，至於象徵現代文明的尚有〈世界鐵道之哩數〉：

據今年陽曆六月公布之世界鐵道之統計，於諸大陸既建設之鐵道之哩數如下：

	哩數
亞細亞	五〇、五九三
歐羅巴	一九二、二五一
亞非利加	一六、五三八
北亞美利堅	二五三、零九八
南亞美利堅	三八、八五九
濠洲	一七、四四一
總計	五六二、七八〇 (10 期〈丹隱居譚塵〉，頁 3-4)

引文中分為亞、歐、非、美（分為北美、南美）、澳洲五洲統計，亞洲鐵路統計雖未說明有哪些國家，但從上述引文可見，修建鐵路在晚清已開始受重視，甚至成為文明與否之象徵，此可追溯至 1889 年清政府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後，開啟的一連串鐵路修建運動。而中國人首次自行建設完成的京張鐵路（由北京西直門經居庸關、沙城、宣化至河北張家口），1907 年 3 月運煤的京門支線（現為京門鐵路）開始建設，1908 年 9 月竣工²⁰。1908 年之前中國建設完成的鐵路已至少有七條²¹，此條引文呈現出譯者認為亞洲國家之一的中國，已具備現代文明國家之特徵，故將亞洲列於名單之首，而非按照鐵路哩數多寡排列，呈現了譯者本位主義的思考。

由「政治情勢」和「科技文明」兩方面看晚清中國對於世界列強的理解，可知譯者對於當時的政治情勢有某程度的熟悉，而此關心也和晚清中國的現狀有所關聯，比如日俄戰爭對於俄國、韓國的影響，以及俄國第一次革命對於芬蘭、波

19 左鳳榮：《俄國現代化的曲折歷程》（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16。

20 經盛鴻：《詹天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1 年），頁 500。

21 1904 到 1908 年間，中國完成的鐵路有德國 1904 年建成濟南至青島的膠濟鐵路，同年廣州至三水的廣三支線完工；1906 年蘆漢鐵路的北京至漢口段（京漢鐵路）通車；1907 年柳林堡至太原的正太鐵路（即今日的石太鐵路）完工；而寧波鐵路的上海至楓涇及楓涇至杭州段，則於 1908 年完工。同年也完成了南京至上海的滬杭甬鐵路。詳參謝曉鐘：《中國鐵道史》（出版地不詳，1996 年，據民國 18 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影印），頁 335-338、357-361、400-401、405-406。

蘭的影響，皆和晚清中國的革命背景有所聯繫，而這也和報刊本身的時效性、現實性相關。較為特別的是，譯者皆未對於日俄戰爭有任何評價，除了數字統計之外，盡量不加入譯者的個人主觀評價，故與晚清小說對於世界的「想像」文學想像²²，以及其他報刊中對於政治事件的主觀評價略有不同。一方面是因為《小說林》雜誌本身性質與政治較無直接關聯，二方面則是譯者本身政治立場的緣故，而藉此迴避對於文明列強的批判；至於科技文明則可分為「物質」與「制度」兩方面言之，可見晚清對於「文明」的認知與二者大有聯繫，物質先於制度的西化過程²³，也反映在「叢錄」之紀載中，從物質的描述多於制度來看，即可見時人對於二者重視程度不一，而開始重視制度改革的趨勢，也在其中展現，二者的結合導向了中國邁向文明科技國家的最終目標。

參、原始民族的文與野：鄙夷野蠻

「叢錄」中的原始民族多為澳洲和非洲原住民，分別有 6 條和 5 條資料。關於原始民族的紀載，則可分為「食貨」與「風俗」兩部分論述之，以見晚清對於原始民族的理解方式。

一、食貨：文明或野蠻

「食貨」包含了國民經濟的各層面，如「食」的部分有：「澳洲北部某處土民，專賴食鼠為生活。」(11 期〈屑談〉，頁 1) 此引文雖未標明確切地點與民族，但食鼠維生的「奇聞」已足以吸引讀者注意；而「住」的紀載則有〈骷髏街〉：

非洲某處有城，城門有六。所通之街四周圍以本柱，柱上各插一骷髏，計此街共用骷髏一萬二千頭，然街道則頗潔淨。(3 期〈印雪簾簾屑〉，頁 3)

此紀載已呈現出晚清人們對於非洲原始民族「獵人頭」習俗的理解，非洲中西部的剛果有獵人頭族，故此引文或即指此部族。此引文中並未批判其野蠻，只說骷髏街「頗為潔淨」，「然」一字不只表達了譯者的意外之感，也間接反映了中國近代的「衛生」概念，此概念確立於 1905 至 1911 年，並藉此論述種族與國家之危機²⁴，故譯者對於公共衛生的關注，或許暗含了文明與野蠻的相對性。

22 顏健富：〈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1 期（2012 年 9 月），頁 1-44。潘少瑜：〈想像西方：論周瘦鵑的「偽翻譯」小說〉，《編譯論叢》4 卷 2 期（2011 年 9 月），頁 1-23。

23 〔清〕魏源：《海國圖志》「師夷長技以制夷」（1842）是以學習器物為主的西化政策，而 1898 年的維新運動則是學習制度為主的西化政策。詳參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01。

24 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67-71。

斐洲阿比辛尼亞國〔筆者案：非洲衣索比亞〕，現用鎗彈藥筒作為錢幣，流行甚廣。（7期〈屑談·紫崖隨筆之二〉，頁4）

衣索比亞的輔幣一共有三個系列流通，發行時期分別為 1936、1969、1996-1998 年，1945 年比爾取代先令成為衣索比亞的貨幣，可見 1908 年時衣索比亞尚無統一流通的貨幣，「用鎗彈藥筒作為錢幣」正反映出原始社會以物易物的型態。譯者在叢錄欄以報導事實的口吻，提供了晚清中國讀者對於非洲奇風異俗的想像管道。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也正處於晚清幣制改革的第三個時期：光緒 32 年至宣統 3 年（1906-1911），制定新貨幣法規並頒布「幣制則例」24 條和「兌換紙幣則例」19 條²⁵。引文中對於衣索比亞貨幣狀況的關注，呈現出晚清對於現代幣制的概念已和西方接軌，並同時關注起其他國家的幣制使用現狀。

二、風俗：迷信或先進

至於風俗方面，則有〈女權極重之地〉：

歐美女權之貴重，為世界所共知。乃不料亞非利加洲之阿必西尼〔筆者案：即為衣索比亞〕地方，其女權之重大，更為可驚者。該地法律定財產為女人所應得，為夫者如有失歡於妻等事，妻有立刻放逐其夫之特權。夫若願意認罪，須賠償牛一頭或駱駝一匹，即可免罪。若妻則隨意可侮辱其夫，且無論何時，得任意離婚或放逐其夫，無人敢非議者。（12 期〈海外逸聞〉，頁 5）

女權在晚清已開始受重視，1904 年起女子教育萌芽，因此 1903 年至 1911 年創辦了近 20 份婦女報刊，具有代表性的有丁初我《女子世界》、1907 年（光緒 33 年）2 月秋瑾創辦《中國女報》、陳志群《神州女報》、馮活泉《嶺南女學新報》、陳誠《婦孺日報》、馮德生和李虛我《湖北女學日報》、謝振與陳志群《女報》等²⁶，而女性參政權也開始受到關注²⁷。然而上述引文卻對衣索比亞的女權重大感到「不料」與「可驚」，歐美女權反在其下。女性不只有財產權，還有放逐丈夫與任意離婚之權利。然而衣索比亞彼時是否有母系氏族，仍待考。譯者雖未評價此風俗之優劣，但由此可見女權在晚清已受重視，故譯者在蒐集〈海外逸聞〉時不免關注此議題，既為「逸聞」，其真假與否並不受重視。

而鄙夷其他民族的文化風俗者，則如〈哥薩克族之迷信〉：

25 卓遵宏：《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一八八七-一九三七》（臺北：國史館，1986 年），頁 422。

26 胡桂香：〈晚清婦女報刊出版略論〉，《編輯之友》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2。

27 思綺齋著 12 回《女子權》，由作新社出版於光緒 33 年（1907 年），假想女子參政活動的情形。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 年），頁 813。

俄國哥薩克族者，有異俗。凡星期一日，無敢易衣者。據云不爾，則必得皮膚重病；星期四不食肉，有犯者，肉中必生蟲，不能適口也；休息日不紡績絨線，否則羣羊必得瘟病。母雞伏雛時，必不與以雙數之卵；出葬日必以餘饌投河中，不投河，死者將託怪形出現，以懼生人。且食時亦無敢以刀切饅頭者，惟手以擘之而已。種種迷信，野蠻民族，大率有之。(4期〈印雪移麓屑〉，頁1)

哥薩克人是生活在東歐大草原（在波蘭、莫斯科公國、克里米亞汗國、土耳其帝國的交界）的游牧民族²⁸。引文中描述哥薩克族的民間習俗，包含星期一、星期四與星期日、出葬日等禁忌，並以「異俗」稱之，可見「叢錄」的「記異」特色，譯者視之為「迷信」並貶為「野蠻民族」，藉此提高自己在世界各國中的地位。

另外，歐洲小國的風俗也是「叢錄」所關注的「記異」，如〈葡萄牙之異俗〉：

葡萄牙之女子，每喜效男子之蓄鬚，而捲其兩端，以為趨時。據云初蓄時，亦頗不惡，日久漸成黑硬，則殊碍觀瞻也。(4期〈印雪移麓屑〉，頁1)

在「叢錄」中，葡萄牙的相關紀載唯有此條，因此看不出譯者對於葡萄牙的定位是文明列強或是邊緣小國，然而對於葡萄牙女子趨之若鶩的風尚，譯者仍是明顯站在自我本位的審美觀，批評此「異俗」乃「殊碍觀瞻」，並以採訪的口吻（「據云」）增加此風俗之真實性。由上述例子可見，譯者對於世界列強的文明與先進大加讚譽，但若不符一般中國人認同之風俗文化，仍易被譯者鄙夷為不文明的「異俗」。

由上述可見，《小說林》「叢錄」中對於原始民族的理解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具體生活的器用，二是抽象層面的風俗，對於原始民族生活中的事物，晚清譯者多秉持一貫的客觀立場，而未明確暗示文野之分。而文化風俗方面，不被當時中國所認同的風俗（包含審美觀與民間禁忌）都被認為是野蠻的。較為奇特的是，在「叢錄」中一向被視為落後的非洲，則因為女權高於歐美而被認為是「海外逸聞」，此乃源於彼時晚清開始關注女權之緣故。另外，「叢錄」雖然蒐羅了各國新聞，但對於世界列強的紀載仍是多於原始民族，故在筆者的統計中，中美、中非、東非、西非並無資料，可見「叢錄」對於非世界列強的國家和民族較少關注。

肆、結論

在《小說林》「叢錄」中，描述異國形象時，大多使用「紀實」的筆法「記異」，然而在此筆法之中，仍隱含了譯者對於「世界列強」和「原始民族」的「文野」之看法，「文野」看似水火不容，但在譯者對於各國新聞的評語中，仍可見

28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50。

二者並非如此截然二分。八國聯軍之後被晚清所關注的世界列強，雖然發明了各式的文明器物與制度，但在戰爭中也仍不免造成眾多死傷，因此譯者一面讚揚列強之文明，卻也略過了戰爭造成死傷的問題。另外，「叢錄」的譯者對於革命也並非全然接受，反映出《小說林》中對於革命的另一種態度。

而原始民族雖有野蠻的風俗迷信，卻也存在著歐美難以企及的女權，譯者雖未評論此現象之文明或野蠻，但從中仍可見晚清中國對於異國的關注，多少反映了自身對於特定議題的關注（如女權、革命等）。此外，譯者對於原始民族的衣食住行並無負面評價，維持其一貫的客觀筆法，亦符合「叢錄」本身的「記異」性質。故探討《小說林》「叢錄」中的異國形象，有助於理解晚清小說之外的文本，不只是將異國作為值得學習的他者，同時透過國外新聞媒體而產生基於事實的理解，譯者也在接受異國資訊的同時，以此反照中國自身之「文野」。由於不同體裁而形成不同的分工方式，「叢錄」所擔任的位置，正填補了「小說」想像之外的現實。由上述可見，《小說林》出版的晚清正是中國對於文明、野蠻等概念型塑的時期，充滿複雜而多元的想像與界義，文本所試圖呈現的正是此不明朗狀態下的多變景象，因此異國形象也有文明與野蠻的混合類型。

至於本研究可再擴充的方向，則有與其他小說期刊（如晚清其餘三大小說期刊）中「叢錄」類型的欄目比較，以見異國形象如何呈現於不同的晚清報刊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叢錄」中對於各國報界的狀況也有所關注，比如〈奇報紙〉描述西班牙的《光報》和《帝國報》（6期，頁3）、〈女賣新聞〉描述西班牙女送報伙、〈報章〉描述英文報紙的流通狀況（10期，頁4）、〈美國報界霸王〉描述《紐約先驅報》之規模（11期，頁4）等等，都可見晚清與世界報界的聯繫關係。又，「中國」的形象在「叢錄」中如何呈現，如何與異國相比較，亦是可詳細探討的問題。

參考文獻

一、古籍

清·小說林總編輯所：《小說林》（一至十二期），上海：上海書局，1980年。

二、近人編輯、論著

左鳳榮：《俄國現代化的曲折歷程》（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朱苾儀：《冷眼觀：晚清《小說林》的敘事與觀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7月。

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北：傳記文學社，1975年。

卓遵宏：《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一八八七-一九三七》，臺北：國史館，1986年。

周雪舫：《俄羅斯史：謎樣的國度》，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

姚洪兵：《《小說林》研究》，江蘇：揚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胡桂香：〈晚清婦女報刊出版略論〉，《編輯之友》第5期，2014年5月，頁102-109。

茅家琦主編：《中國近現代史大事編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郭浩帆：《中國近代四大小說雜誌研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

經盛鴻：《詹天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1年。

潘少瑜：〈想像西方：論周瘦鵑的「偽翻譯」小說〉，《編譯論叢》第4卷第2期，2011年9月，頁1-23。

鄧韻：《小說林社翻譯作品與中國小說現代性》，成都：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5月。

謝曉鐘：《中國鐵道史》，出版地不詳，1996年，據民國18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影印。

簡子婷：《歐洲專利制度整合之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7月。

顏健富：〈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從文學視角觀察晚清小說的「世界」想像〉，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1 期，2012 年 9 月，頁 1-44。

顏健富：《晚清小說的「異國」形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科技部計畫，
(2012 年)，計畫編號 NSC100-2628-H007-021-MY2。

樂偉平：《小說林社研究（上）、（下）》，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
研究輯刊 十八編》，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 年。

〔日〕井口和起著，何源湖譯：《日俄戰爭的時代》，臺北：玉山社，2012 年。

〔日〕森山茂德：《近代日韓關係史研究——朝鮮植民地化と國際關係》，東京：
東京大學，1987 年。

〔英〕大衛·科爾比 (David Kirby) 著，紀勝利等譯：《芬蘭史》，北京：商務印
書館，2013 年。

〔英〕耶日·盧克瓦斯基 (Jerzy Lukowski)、〔英〕赫伯特·紮瓦德斯基 (Hubert
Zawadzki) 著，常程譯：《波蘭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 年。

〔俄〕博克老夫斯基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日〕石川一郎著、潘既閑譯：《俄國
革命全史》，上海：心弦書社，1930 年。

投稿日期：2016/08/29 接受日期：2017/06/12

附錄一、

附表：《小說林》「叢錄」欄各國出現次數統計表

洲	區	國家	期數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計	合計
美洲 25	北	美				2	1	1	4	2	4	2	3	19	20	
		加								1			1			
	中												0	0		
	南	智利	1											1	5	
		祕魯		1										1		
		巴西										1		1		
		(不明)							1	1				2		
歐洲 76	北	挪威									1			1	3	
		瑞典								1			1			
		丹麥								1			1			
	西	英	1			2		5	6	2	4	1	1	22	43	
		法	1	2		1	1		3		7		1	16		
		比						1	1		1	1		4		
		瑞士									1			1		
	東	波蘭		1										1	2	
		哥薩克			1									1		
	中	德		1		1	1	1	7	3	1	1		15	15	
	南	葡			1										1	13
		奧				1		1						2		
		西					1	1	2	1	1			6		
		義							2	1			1	4		
亞洲 32	北	俄		2		1		1	3			1	1	9	9	
	東	中					1	1	1	2	2	1		8	8	
	東北	日			1				1		1	4		7	8	
		韓								1				1		
	東南	印						1		1				2	2	
	中	波斯(伊朗)			1									1	1	
	南	印度					1							1	2	
		錫蘭												1		
		猶太							1				1		2	2
大洋洲 6		澳洲		2			1	1		1	1			6	6	
非洲 5	北	埃及					1							1	1	
	東北	衣索比亞							1					1	1	
	東													0	0	
	南											1		1	1	
	西													0	0	
	中													0	0	
	(不明)									2				2	2	
各期總數				3	9	4	7	8	16	33	19	23	14	7	144	

The Civilized and the Uncivilized--the Exotic Images in “Xiao Shuo Lin”

Chia-Ying Hseih¹

Abstract

In “Xiao Shuo Lin”, “tsong-lu” mostly described the exotic images in using “documentary” strokes to “record new things”, but in this technique of writing, translators had implied the critic about “world powers” and “the uncivilized” between them. After the Eight-Nation Alliance, world powers are concerned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invention of all kinds of artifacts and institutional, it still can not stop many casualties in the war.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lators praised the civilized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ignored the casualties caused by the war. In addition, the translators of “tsong-lu” did not completely accept for the revolutions, so it reflects the different attitude to revolutions in “Xiao Shuo Lin”.

Although uncivilized people have some superstitions, there also exist women’s rights that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feminist, although translators did not comment on this phenomenon of civilized or not. The concerns about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late Qing of China was still visible, and some particular issues that translators concerned (such as feminism, revolution, etc.)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negative evaluation for primitive peoples about their lifestyles, and translators maintain its consistent objective strokes. It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style of “tsong-lu” itself. Therefore, to study “tsong-lu” in “Xiao Shuo Li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exotic images that except in fictions in the late Qing. We do not just see the exotic as “others” to imitate, bu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generated by foreign news, and translators also accepted foreign information from these news to judge if China is civilized or uncivilized. Due to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genres, “tsong-lu” played a role that differs from imagination of fiction, and it is “real”.

Keywords: “tsong-lu” of “Xiao Shuo Lin”, exotic images, civilized and uncivilized, documentary, record new things

¹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a-Ying Hseih, E-mail: 103151505@nccu.edu.tw